

中美关系困境四大原委述评

□ 杨 达

内容摘要 中美关系困境源于中国崛起带来的作为冷战后时代世界霸主美国的忧虑。而这种忧虑背后纠缠着四个方面的深层次原因——“霸权终结”的恐慌、“地缘冲突”的警觉、“大国政治悲剧”的防范以及“错误知觉”的梦魇。解决好这四个问题是缓解中美关系困境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 中美关系 困境缓解 中国崛起 美国忧虑

作者 杨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北京：100872）

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贸易争端的加剧，以及对台军售、伊朗问题、美韩军演等问题的集中爆发，中美两国关系几乎陷入低谷。今年年初，胡锦涛主席访美，中美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定位两国关系为“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无疑为几乎陷入低谷的中美关系带来了缓解之春。探究中美关系的困境，主要源于中国崛起带来的美国心态的转变，这种转变表现在对华政策上便是借重与防范交织，即解决问题时借重中国，但内心深处不信任中国，防范中国。一句话，中美关系困境源于中国崛起带来的作为冷战后时代世界霸主美国的忧虑。而这种忧虑背后纠缠着四个方面的深层动因——“霸权终结”的恐慌、“地缘冲突”的警觉、“大国政治悲剧”的防范以及“错误知觉”的梦魇。正确认识和解决好这四个问题是缓解中美关系困境的根本举措。

金融危机与“霸权终结”的恐慌

美国历来寻求世界霸主地位，并坚信自己称霸一定能给世界带来稳定。这种诉求与其对“霸权稳定理论”的信仰密切相关。正是这个信仰使得美国在面对自身实力相对过去下滑，而中国实力又相对提升的现实时，必然产生“霸权终结”的恐慌，从而对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者”进行本能的防范，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设置障碍，进而造成中美关系的僵局。

“霸权稳定理论”由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并由克拉斯纳与吉尔平相继完善，其主要观点如下：一是霸权国家要真正成为稳定国际经济体系的力量，必须具备六个基本条件。这六个基本条件中，金德尔伯格提出了五个，即：1.为过剩产品提供市场；2.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期；3.当国际货币体系因恐慌而停止运作时，

能够发挥“再贴现”机制的作用，提供融通的资金（实际上相当于中央银行的操作）；4.管理外汇兑换体制；5.能够协调不同国家的国内货币政策。^[1]美国学者戴维·莱克针对跨国投资的发展，又提出了第六个条件，即国际经济必须清晰定义并保护运转过程中货物以及海外资产（包括短期投资和直接投资）的基本产权。^[2]由上述六个基本条件可以得出结论：实力是保持霸权的基本要素。同时，金德尔伯格等强调，霸权稳定体制中只能有唯一一个“霸主”，否则体系难以稳定。他指出，“为了稳定世界经济，必须有一个稳定者，而且只能有一个稳定者”^[3]。另外，霸权稳定理论还强调了其他一些因素，包括：1.经济力量是霸权的基础，控制经济资源的能力包括资源、市场、资金、技术等。保持经济地位的最后基础是经济的灵活性和流动性；2.霸权稳定的要素应当是霸权国、自由意识形态和共同利益；3.霸权国家需要自我牺牲，因为开放稳定的经济体系是公共物品，为了维持它，霸权国家不得不付出代价；4.在实力基础上的“规则领导”，“为了限制冲突，确保平等，或者创造和谐一致的环境，这种体制规定合法的行为，并禁止非法的行为”^[4]。

二是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必衰”，即任何霸权都难以摆脱衰落的命运，美国也不例外。这一观点的基础是，霸权对国际秩序的控制，主要建立在“经济剩余”的基础之上。但是，在经济剩余减少的同时，安全开支却越来越大；技术转让和市场开放的结果是培养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导致竞争优势的丧失；“搭便车”现象日益严重，最终导致霸权国家维持霸权的能力大大下降，与此同时，霸权国内要求解除国际义务的呼声日益高涨。

三是霸权稳定理论强调霸权的丧失将导致不稳定，特别是争夺霸权的战争将导致国际体系的不稳定。

四是霸权国的衰落将对国际贸易体制产生很大的影

响。霸权稳定体制本身包含着“自我失败”的成分，主要是随着“搭便车”现象的加重，以及霸权国的竞争力下降，使得其财政无力继续承担自由贸易的代价；另外，霸权国内部支持自由贸易的意志也在下降。霸权国的衰落必然导致国际贸易体制的混乱。^[5]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成了事实上“后冷战时代”的世界霸主。然而，好景不长，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不期而至，这让遭受经济损失和社会痛楚的世人，因为这场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恶浪而对美国格外责备。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力量的空前强大，特别是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能力的加强，这些都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一个有别于美国的正在崛起的大国形象。于是在美中实力此消彼长的情景下，美国必然担心其“霸权稳定”的终结。具体来看，首先，正如前面“霸权稳定理论”指出的经济力量是霸权的基础，而美国在经历了金融海啸后已逐渐失去了这种基础：它已无力为过剩产品提供市场，甚至其自身也需要中国市场；在经济衰退时期不仅无力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无力提供融通资金，相反通过不断放任美元贬值，将解决危机的成本转嫁到其他国家；对外汇兑换体制的管理、对不同国家的国内货币政策的协调已不像之前那样得心应手。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在一定意义上还带来了更为深刻的心理性和思想性冲击，使得世界的政治文化和价值信仰体系由此受到了强烈的影响，其具体表现为在许多国家，所谓“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式”遭受到了广泛的信誉减损。其次，对金德尔伯格所强调的“霸权稳定体制中只能有唯一一个‘霸主’，否则体系难以稳定”这一信条的坚持，使得美国将正在实现经济崛起的中国视为挑战其唯一霸主地位的“潜在霸主”。最后，正是美国实力相对下滑的客观事实，使美国正一步步逼近霸权稳定理论所强调的“霸权必衰”的结局，而连同霸权丧失所带来的国际贸易体制混乱，以及国际体系不稳定的负面影响，使美国的担忧进一步上升为恐慌。这样一种负面情绪必然使其视潜在挑战者中国为最大的威胁，于是美国便出现了旨在遏制中国进一步崛起的对华围堵政策。

“地缘冲突”的警觉

美国一方面高举道德至上的理想主义大旗，另一方面又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绳的现实主义原则摆在第一位；而在其现实主义的思考以及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地理政治理论往往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地缘冲突”警觉，很大程度左右着美国对中国的策略。

英国地缘政治家麦金德将世界分为三个区域：“一是欧亚大陆中心的内陆区域，二是位于边缘的‘内新月形地带’，三是近海岛屿、美洲、澳大利亚构成的‘外新月形

地带’。”^[6]在此基础之上，美国地缘战略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认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是世界上最具有权力潜质的场所，成为权势争斗的发源地。这不仅因为世界上的人口和资源主要集中在这一地区^[7]，且由于“东半球的权力冲突向来向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区的关系有关，与边缘地区内的权力分布有关，与海上势力对大陆沿岸的压迫有关，最后，与西半球参与这种压迫有关”^[8]。回顾历史，在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俄国“都是站在一起反抗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领导的边缘地带国家”^[9]的史实更增添了该理论的说服力。而具体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边缘地带”理论则主要关注其战略包围问题，即“美国的安全总是同欧洲和亚洲的均势相伴的，美国面临战略包围的可能性只出现过四次，其中最后一次是在二战期间，因为德日同盟向世界呈现了两个‘控制着巨大战争潜力的巨型帝国’，它们有可能会颠覆欧洲和亚洲的均势，尽管美国非常强大，但若面对一个统一的边缘地带，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包围”^[10]。

因此，以“边缘地带”理论为国家战略风向标的美国，不可避免地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国产生地理结构上的冲突，而中国传递出的和平发展信号只会被坚信地理政治现实主义理念的美国荒谬地视为一种战略欺骗。如今，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中国强势崛起的世界格局中，这种“地缘冲突”给予美国的压力会进一步被放大，美国对此警觉的增强构成中美关系困境的一个深层动因。

进攻性现实主义思维与“大国政治悲剧”的防范

美国的对外政策决策者之所以制定出导致中美关系困境的对华政策，一定程度上还因为受到了约翰·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思维的影响，这从对其《大国政治的悲剧》的剖析中可以得到答案的。

《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中心思想是：“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成功实现（美洲）地区霸权的国家（拿破仑、希特勒、苏联和日本曾先后试图在欧亚大陆建立地区霸权，但都失败了），它扮演了一种‘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以防止出现任何地区霸权；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之间激烈的安全竞争将不可避免，因而作者反对接触而主张及早遏制中国”^[11]。若进一步考察“悲剧”的涵义，则可清楚看到美国将中国视为威胁的逻辑起点在于对“悲剧”的防范。大国政治为何处于一种悲剧状态？因为“大国注定要进犯他国”。所谓“悲剧”，其涵义有二：其一，大国安全竞争是零和博弈——这是悲剧的必然性：“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而且可能永远如此。……每一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利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然而，大国……

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权，即体系中唯一的大国。”^[12] 根据这种悲观式、循环式的历史观，米尔斯海默指出，鉴于中国实力的日益增长，它最终会在亚洲提出中国版本的“门罗主义”，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存在。

其二，进攻性企图和权力与生存的不恰当紧密结合导致悲剧的恒久性：“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除了那种想对潜在的对手保持支配地位的一时霸权。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心满意足，相反，它们会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它们几乎总是拥有修正主义意图，倘若能用合算的代价达到目的，它们会以武力改变均势……除非一国达到了最高的霸权目的。然而，由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取得全球霸权，因此整个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13] 这种悲剧的持久性是以其彻底的现实主义为基础的，即不管大国的性质如何，都会遵循这种逻辑。因此，米尔斯海默指出，强势崛起的中国将来必会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

“错误知觉”的梦魇

美国政治家们的“错误知觉”如同梦魇一般无时无刻不缠绕在其身边，蚕食着他们的理性判断，导致将中国作为美国威胁的错误认知的出现。而这种错误知觉的产生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主观认知建构中的社会刻板意象效应和晕轮效应在美国的“中国威胁”错误知觉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就美国而言，其基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念而对中国民族性格和特点等形成了概括而稳固的负面看法，之后又因晕轮效应而使这种负面看法被进一步放大，最终导致其对中国错误知觉的产生。事实上，首先源于间接资料（即通过欧洲人碎片化的描述）而形成的美国对中国社会刻板意象就非正面，因为自西方白人占据世界主导地位以来，理性、爱好和平等一系列正面词语几乎就是西方的代名词，相反，非理性、偏狭、无逻辑、天生暴力倾向等经常与东方联系在一起，而欧洲人的东方主义几乎完全被美国人继承下来并适用于美国人一直以来对远东特别是中国的看法。^[14]

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错误知觉”还源自个体心理因素，即主观认知建构中美国的需要与价值对威胁信号的选择性认知和判断。就美国而言，其对中国的错误知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源于上述选择性认知后的“有意行为”。美国从建国以来便自认为与众不同，自认为处于“山巅之城”，有着在世界上传播美国梦和美国价值观的强烈使命感。二战以后，美国的救世思想随着其活动范围的扩大而触及远东的中国，这就使得中国成为证明美国文化具有普世优越性的角色，成为实现美国民族抱负、国家使命和树立美国国家威望的巨大试验场。然而，美国意识形态神话

却被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打破，这一“试验”的失败不仅沉重打击了美国对其价值普世性的信心，更损害了其作为一个大国的自尊。

正是以上四个方面，决定了如今中美关系困局的缓解，更多地有待于美国减少直至消除视中国为威胁的忧虑。而这对中国来说，应针对导致美国忧虑的以上四个方面的动因，作出理性的战略思考和应对。

首先，中国应该认清自己以及自己同美国的关系。第一，中国是所有大国里最复杂的国家，人口众多，内部发展不平衡，现在又处在社会转型期，新旧矛盾都集中在一块。所以，在很多问题上中国都呈现出双重特性——在经济上，发达和发展中兼备；在文化特性上，现代和传统兼备；在战略上，强大但又很脆弱，是“一个脆弱的超级大国”。第二，中国人应该对中国有自信，中国只有自己能够击败自己，而绝不会被别国击败。就认清自己同美国的关系而言，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尚未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步。

其次，基于对自己以及自己同美国关系的清醒认知，中国在对美政策上要坚持两个原则：在战术上，中国应继续强调积极有所作为，通过积极作为向美国传递中国并非当前国际体系的变革者，而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战略上，中国还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和平发展大战略，因为只有未来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超越美国，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参考文献：

- [1][3] 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292、305.
- [2] David Lake. *Leadership, Hegemon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3 (4).
- [4] 罗伯特·吉尔平.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93、88、91.
- [5] 王勇. *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 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8：80.
- [6][7] 吴征宇.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及其战略含义. *教学与研究*, 2006 (5).
- [8][10] 斯皮克曼. *和平地理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 [9] Donald W. Meinig. *Heartland and Rimland in Eurasian History*.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956 (3).
- [11][12][13] 约翰·米尔斯海默，唐小松等译. *大国政治的悲剧*.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8、2、2.
- [14] 施爱国. *东方主义与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 *南开学报*, 2002 (6).

编辑 南木